

日本新宗教团体创价学会与公明党之政教关系

暴风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北京 100029)

摘要:日本新宗教团体创价学会继承日莲正宗“立正安国”的政教合一理念,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二战后民主法治环境中积极开展政治活动,于1964年成立公明党。创价学会与公明党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四个时期:教团主导政教合一时期(1964—1969)、政教分离时期(1970—90年代初)、教团成为政党斗争工具时期(20世纪90年代)、政党保守化与教团集权化时期(2000年至今)。二者关系的变化说明从战后民主化到政治、宗教多元化的今天,宗教势力依然对日本政坛有深远的影响,同时政党的本质属性决定宗教政党必须以夺取政权为最高目标,在复杂多变的现实政治斗争中,宗教政党的政治主张往往与宗教理念发生冲突,形成对其母体教团的反噬效果。

关键词:日本;新宗教;创价学会;公明党;卡里斯马

中图分类号: B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2458-(2020)01-0046-10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0.01.006

引言

二战后美军占领日本,对日本进行了一系列民主化改革。在宗教方面,废除国家神道体制,确立了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宗教团体不能以宗教身份直接参与政治活动,而是以支持某个政党、政治家,组建政党等政治团体,或者以推动带有政治色彩的社会运动等形式展开。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许多宗教团体开始积极开展政治活动,日本政党政治逐渐呈现多元化趋势。目前为止,成功组建政党并使之成为执政党的只有佛教系新宗教团体创价学会。

创价学会成立于1930年,是佛教系新宗教代表性教团之一,起初作为传统佛教日莲正宗的在家居士团体,1991年之后与日莲正宗分离,在保持

核心教义不变的情况下,开始在日本国内外积极发展。创价学会二战期间曾被政府取缔,战后教团规模迅速壮大,50年代开始开展政治活动,1964年正式组建公明党。公明党1993年首次成为联合执政党之一,1999年至今长期与自民党组成执政联盟,虽然2009—2012年两党短暂下野,但已建立起稳定的合作关系和执政模式。在战后70年历史中,日本国内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社会与时代的转变,创价学会和公明党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很大变化,但无论是60年代的“一体不二”,70至90年代的“政教分离”,亦或是1999年至今的“趋同保守”,二者之间都存在一定程度上彼此影响的关系。然而,这种影响关系不仅有正向相互促进的一面,而且还有负向相互削弱的一面。以往研究的着眼点大多在于二者彼此的正向互相促进关系。例如,分析认为,公明党在日本政坛

收稿日期: 2019-07-29

作者简介: 暴风明(1981—),男,天津人,文学博士,讲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与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联合培养博士后,主要从事日本宗教文化研究。

的嬗变中地位的重要性在于其母体创价学会的大量选票支持，相关研究有徐万胜^[1]、申东镇^[2]；分析创价学会的宗教理念对公明党政治理念的单方面影响，相关研究有何劲松^[3]；研究创价学会第三代会长池田大作对华友好理念决定公明党对华友好政治主张与实践，相关研究有黄大慧^[4]、李方琦^[5]、汪鸿祥^[6]；以日本战后五六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为中心，分析创价学会组建公明党参与政治的社会意义，相关研究有王新生^[7]。近年来，李若愚^[8]、宫笠俐^[9]等个别时政研究指出，创价学会对公明党在自卫队海外派兵、修宪等问题上附和自民党政策主张而发出反对声音，但这些研究的重点在于对今后日本政坛走向的预测，往往单纯指出部分事实，缺乏对创价学会和公明党之间关系的深入分析。

与此同时，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来自日本新闻政治部记者的研究，如药师寺克行^[10]、中野润^[11]。这类研究在体例、内容上往往有很多相似之处，侧重于对政治、历史事件本身的介绍和梳理，理论视角相对缺乏。另一类是宗教学立场出发的研究，如中野毅、塚田穗高。中野毅结合宗教现象学和宗教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将二战后日本宗教市场设定为“多元宗教世界”框架，对战后宗教改革、民众宗教团体的政治运动进行分析，提出战后日本宗教与政治结合的三种方式，对创价学会作为宗教团体独自组建政党参与政治的案例进行重点分析，指出创价学会参与政治活动的根源在于其宗教理念，即日莲佛法以《法华经》大乘佛教主张自利利他、度己度人的成佛解脱方式为核心，通过参政的方式改造社会，实现改善个人与社会的现世救济。中野毅认为创价学会的政治活动是战后民众参政，实现民主政治的一种方式，是“近代化过程中，在官僚制形式主义蔓延的

政治世界中，复活人类热情与理想、利他精神与慈悲精神的尝试……促进了日本宗教界对政治和公共领域事物的关心和参与热情。是在近代世俗主义下，被压抑在个人私领域的宗教摸索社会政治贡献路径的努力”^[12]。虽然中野毅也指出了政治和宗教属性的不同意味着参与政治活动给宗教团体带来潜在的危害，但并没有对此展开深入分析。塚田穗高基于户田城圣和池田大作的演讲材料进行分析，从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角度分析了创价学会参与政治的理念，以及这一理念在组建公明党前后的演变，指出创价学会国家主义意识的特殊性来自日莲正宗排他性教义与第二代会长户田城圣的个性化阐释，创价学会选择独自建立政党参与政治的方式根源在于日莲正宗的原教旨主义教义^[13]。塚田穗高考察的重点依然停留在以1970年“言论出版妨碍事件”为节点的创价学会与公明党之间关系的转变，虽然对70年代以后的公明党的选举数字做了统计，但缺少对公明党与自民党组成自公执政联盟之后的创价学会与公明党之间政教关系的考察。

综上所述，对创价学会和公明党之间政教关系相互牵制、负向相互削弱的一面鲜有研究涉及。本文将梳理创价学会与公明党之间关系演变历史，立足具体历史事件，重点考察二者在现实政治中的动态平衡关系，以政教关系的视角分析宗教政党对其母体教团的分化与反噬作用，重点分析1999年以来公明党与自民党组成执政联盟之后，公明党的政策倾向给创价学会带来的影响，以及创价学会相应的组织转变。

关于创价学会的历史与发展，日本学者西山茂^①、大西克明^②、猪瀬优理^③已经做了详细论述，本文在此研究基础上结合公明党的发展历史，作出二者的对应时间表，见表1。

-
- ① 围绕其参政路线的变化过程、本门戒坛论的变迁、“内栖型”宗教的自立化过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将创价学会分为“前史阶段”“戒坛建立运动阶段”“与日莲正宗对立阶段”“独立在家教团阶段”四个阶段。详见：西山茂. 日蓮正宗創価学会における〈本門戒壇〉論の變遷 [C] // 中尾堯. 日蓮宗の諸問題. 東京：雄山閣，1975：241—265；西山茂. 内棲宗教の自立化と宗教様式の革新 [C] // 沼義昭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編集委員会. 宗教と社会生活の諸相. 東京：隆文館，1998：113—141；西山茂. 変貌する創価学会の今昔 [J]. 世界，2004（6）：170—181；西山茂. 創価学会の基礎思考——牧口常三郎の価値論の場合 [J]. 東洋学研究，2017（54）：263—273.
- ② 从教团排他性的角度考察教团与社会的对应关系，将创价学会分为“再建期”“基本路线确立期”“参加政治期”“新路时期”“独立期”五个阶段。详见：大西克明. 本門佛立講と創価学会の社会学的研究 [M]. 東京：論創社，2009：150—152.
- ③ 从教团生命周期论的立场出发，将创价学会分为“教团发生期”“教团形成期”“教团发展期”“教团安定期”“教团转换期”五个阶段。详见：猪瀬優理. 信仰はどのように継承されるか——創価学会にみる次世代育成 [M]. 北海道：北海道大学出版会，2011：35.

表1 创价学会与公明党发展历史对应时间表

创价学会		公明党	
时间/年	分期	时间/年	分期
1930—1944	创价教育学会期		
1945—1957	战后恢复重建期		
1958—1969	全面进军政治期	1964—1969	政教合一国教化期
1970—1990	宗门矛盾与海外事业发展期	1970—1992	政教分离稳步成长期
1991—2009	脱离日莲正宗自立发展期	1993—1998	短暂执政与分化组合期
		1999—2009	第一次自公联合执政期
2010 至今	后池田期	2012 至今	第二次自公联合执政期

注：2009年9月—2012年12月，民主党上台执政，公明党与自民党成为在野党

一、教团主导政教合一时期 (1964—1969)

20世纪50年代开始，创价学会设立文化部、公明政治联盟、公明会，最终于1964年建立公明党。一直到1970年“言论出版妨碍事件”，创价学会与公明党之间的关系高度一体化。公明党以实现宗教利益最大化，建立政教合一的国教体制为最终目标。创价学会在与公明党的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公明党的执政理念来自创价学会主张建立国立戒坛、使日莲正宗国教化的宗教思想。由创价学会主导的二者一体关系在这一时期尤为显著，主要表现在人事和政策纲领两方面。

在人事方面，公明党党员全部是创价学会会员。在领导层面上，公明党首任党委员长原岛宏治当时是创价学会理事长。副委员长辻武寿是创价学会理事，后接替1964年12月突然去世的委员长原岛宏治，成为第二任党委员长，1967年让位于竹入义胜后仍兼任党内以及创价学会副会长和最高指导会议议员等要职。首任书记长北条浩是创价学会副理事长，同时也是创价学会青年部参谋室主任参谋，曾经直接隶属于参谋室室长池田大作。

在政策纲领方面，1964年公明党的纲领充分体现了宗教政党的特色，主要包括四点内容：“（1）王佛冥合理念和地球民族主义是与宇宙时代相符合的世界观和对恒久和平的新指导理念，通过其构筑世界恒久和平的基础；（2）通过以尊重人性

为基调的人性社会主义实现个人幸福与社会繁荣一致的大众福祉；（3）建设佛法民主主义，即以尊重人性为基调的民主主义基础，建设包含社会所有阶层民众一同进步的大众政党；（4）彻底清算选举腐败和政治腐败，确立公正廉明的议会制民主主义。”在结党宣言中指出，“公明党力图以王佛冥合和佛法民主主义为基本理念，彻底净化日本政界，确立议会制民主主义的基础，植根于大众，实现大众福祉。”^{[14]37}由此可见，“王佛冥合”^①作为创价学会国教化理念的核心，也成为这一时期公明党政治理念的出发点。

二、政教分离时期 (1970年—90年代初)

公明建党以来，在建党理念、人事关系、政策纲领、政治主张等方面与创价学会保持了高度一致的关系，创价学会的宗教目的在于建立象征着所有民众全部皈依日莲正宗的国立戒坛以实现本门信仰的民众最大化，为实现这一目的开展政治活动，组建政党参选争夺众议院的议席。然而，鉴于二战期间国家神道体制给日本造成巨大伤痕，在政教分离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社会，创价学会政教合一的主张必然遭到社会舆论的反对。同时，虽然公明党作为宗教政党，其母体是宗教团体，但本质属性依然是政党，政党必然会在权衡宗教理念的情况下优先顾及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从而不断适应代议制体制下政党政治的运营规则，调整其作为政党

① 户田城圣于1956年至1957年在《大白莲华》上发表连载《王佛冥合论》，指出将政治（王法）与宗教（佛法）的冥合作为创价学会进军政界的基本理念，创价学会对政治关心的原因在于“三大秘法”南无妙法莲华经的广宣流布，即建立国立戒坛。

的独立性。这一时期的“言论出版妨碍事件”成为导火索，公明党开始在理念上逐渐与创价学会有所分离，这种分离在随后发生的“创共协定事件”中进一步体现。

（一）“言论出版妨碍事件”

1969年，日本政治学者藤原弘达出版批评创价学会的《斩创价学会》一书^[15]，并称该书出版遭到创价学会和公明党，以及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田中角荣等人的反对和阻挠，日本共产党率先展开对创价学会和公明党的批判，由此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被当时媒体称为“言论出版妨碍事件”。

1970年5月3日，池田大作在本部干部会上就此事件公开道歉，声明自己终生不进入政坛，并针对外界质疑做出五点回应：（1）创价学会广宣流布的目标是以佛教为基础的文化运动，参与政治是其中一环，但其本身并不是目标；（2）日莲正宗的根本道场本门戒坛并非必须是国立的，不意味着要通过国会决议确定建立，一向否定日莲正宗国教化，今后也将继续否定；（3）公明党的存在目的是为了实现在大众福祉，与宗门和创价学会的宗教活动无关；（4）为明确实现创价学会与公明党的分离，解除议员在学会中兼任的职务；（5）学会作为公明党的支持团体支持公明党选举，同时也坚持会员支持不同政党的自由^[16]。随后的1970年6月25日，公明党召开大会，删除了公明党纲领中“王佛冥合”“佛法民主主义”等带有宗教色彩的用语，不再提及“建立国立戒坛是公明党政治活动的目的”之类的说法，将党的基本理念概括为“人性尊重的中道主义”，将党的性格定位为“国民政党”，从而摆脱“宗教政党”“政教一致”等舆论批判^{[14]93-94}。

1969—1970年的“言论出版妨碍事件”成为创价学会与公明党关系的重要转折点。面对日本共产党等在野党要求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到国会进行询问等提议，首相佐藤荣作和自民党干事长田中角荣予以否定，之后借此多次成功要求公明党支持自民党田中派候选人。1970年5月16日，池田大作在记者招待会上，也对“言论出版妨碍事件”以来公明党政策路线倾向自民党右倾化提出批评，正如日本学者药师寺克行分析指出：“对自民党而言，‘言论出版妨碍事件’并不是攻击公明党的材料，而是分化在野党，拉拢公明党的绝好材料。”^{[10]67-70}因此，虽然该事件并没有在短时间内使创价学会与公明党彻底分离，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创价学会

宗教理念对公明党政治理念的影响，实现了教团和党在高层干部人事组织关系的分离，标志着创价学会与公明党政教关系转折的开始。

（二）“创共协定事件”

1974年参议院选举，首相田中角荣因政治献金备受批评，选举结果自民党勉强过半，在野党看到政权更替的希望，纷纷寻求联合，日本政坛进一步形成“全野党共斗”的局面。公明党在日本共产党、社会党等左翼革新阵营主导对抗自民党的在野党联合斗争中步调一致，于1973年围绕《日美安保条约》提出了公明党历史上最为激进的主张，要求立即废除《日美安保条约》。然而，公明党与日本共产党在政治理念和争取选票等方面存在较深的矛盾，在1969—1970年的“言论出版妨碍事件”中，日本共产党起到急先锋作用，日本共产党与公明党、创价学会的矛盾不断加深。

为缓和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创价学会主动伸出橄榄枝，联系著名作家松本清张，请求其作为中间人向日本共产党传达池田大作想与其委员长宫本显治会谈的消息。经过创价学会青年部部长野崎勤和日本共产党常任干部会委员上田耕一郎七次会谈，双方于1974年12月28日签署协定，达成和解。翌日，池田大作与宫本显治在松本清张家中会谈，并确认协定有效期10年，该协定被称为“创共协定”。协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认识彼此组织与活动的性格、理念、立场，互不侵害；创价学会不采取敌视共产主义态度；日本共产党无条件拥护包括传教自由在内的信教自由；双方停止彼此诽谤中伤^[17]。协定签署之后并没有立即对外公开，半年之后的1975年7月8日被《读卖新闻》披露，7月27日创价学会和日本共产党方面才公开承认这一协定的存在。也许正是由于担心协定会引起舆论风波，使支持创价学会、公明党和共产党的民众信念产生动摇，双方才没有对外公开。协定一经公开便立即招致公明党的强烈反对，公明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明确表示“不与共产党合作夺取政权”，8月1日进一步表示“协定与公明党政治路线存在多处不一致”，明确否定协定内容，一度造成创价学会和日本共产党十分尴尬的局面。日本共产党随后也表明了“没有合作夺取政权就没有共存”的强硬立场。创价学会最终还是与公明党保持口径一致，池田大作在8月20日的演讲中表示创价学会不会加入日本共产党主张的“国民统一战线”^{[10]96-99}。“创

共协定”的破产意味着公明党以现实政治利益出发，在政党政治的实践中逐步摆脱创价学会的影响，也说明公明党和创价学会之间存在一定分歧。当事人松本清张曾在1980年1月刊的《文艺春秋》中撰文回忆当时会谈情况指出，创价学会野崎勳表示让公明党接受创共协定需要花一些时间，但一定会实现。而与此同时野崎勳也承认，池田大作与公明党执行部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距离^[18]。1975年10月，公明党改变之前认为《日美安保条约》应立即废除的强硬立场，而主张应通过交涉逐步废除，并重申政治中道路线。至此，公明党结束了70年代初期短暂的左翼革新路线，在安保和自卫队政策方面逐步趋同自民党的保守主义政策。

20世纪70年代为止，创价学会在日本国内完成了迅猛发展阶段，1951年户田城圣出任第二代会会长时只有约3000名会员，至1970年池田大作提出政教分离口号时，会员规模已经达到755万户，2005年教团最后一次公布会员规模为827万户，至今不再公开更新数字。70年代至1990年这段时期，创价学会由于“言论出版妨碍事件”而调整战略，指导思想和实践活动的重心相对地由政治活动转移到宗教文化活动。经历两次“宗创纷争”之后，创价学会最终脱离日莲正宗独立发展。同时，创价学会开始更加积极地开展海外传教，扩大国际影响力。1960年池田大作出任会长以来，开始在巴西、美国等国家的日裔移民中传教，70年代发展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区。1975年，51个国家和地区的创价学会支部集聚关岛，成立了“国际创价学会”（SGI）。池田大作在国际舞台积极开展民间外交，与世界各国政要、宗教领袖、学者、艺术家、作家等展开对谈，内容涉及和平、反战、反核、文化、艺术、教育等诸多方面。这一时期创价学会从急剧扩张期进入稳定发展期，开始强调社会参与、地域贡献，活动涉及诸多领域，成为在日本与国际舞台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新宗教团体。

公明党从70年代开始愈发表现出政党灵活务实的一面。公明党在“言论出版妨碍事件”中受到自民党田中派的庇护，但为有意与自民党保持距离，并迎合70年代初期日本政坛左翼革新政党势力的大潮，提出左翼色彩浓厚的政策主张。随后由于政治理念与争夺选票等原因，公明党放弃与左翼阵营的合作，回归到相对中立保守的政治立场。

因此，无论是创价学会转移活动重心，还是公明党有意摆脱创价学会的影响，在1970年到90年代初的时间里，创价学会在人事和理念方面对公明党的影响力有所减弱，但在历次大选中，创价学会都能够为公明党提供稳定的大量选票，这一点也成为后来自民党选择与公明党开展合作的重要原因。

三、教团成为政党斗争工具 时期（20世纪90年代）

1989年日本进入平成时代，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开始了“失去的二十年”。平成时代的日本政坛呈现出分化组合、变动频繁的乱象，受到里库路特事件、消费税增税、宇野宗佑性丑闻等事件影响，在1989年的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大败，形成“扭曲国会”。1992年，自民党竹下派分裂，小泽一郎脱离竹下派成立羽田派，在1993年众议院大选前带领44名议员退出自民党，直接导致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大败下野，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的“五五年体制”结束。在这短短的10年间，公明党可谓跌宕起伏：90年代初首次成为执政党入阁；90年代中期分党对抗自民党，遭到自民党围绕与创价学会政教关系的各种打击；90年代末复党，并与自民党联合。20世纪90年代是日本政坛从“五五年体制”逐步过渡到“自公体制”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创价学会对于公明党的双刃剑效果尤其明显。创价学会既是公明党的稳定票仓，保证了公明党在历次大选中能够获得议席，但同时创价学会也成为自民党牵制公明党的一张牌，自民党利用这张牌瓦解新进党。公明党在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这一不利于小党生存的选举制度中，经历了加入小泽一郎主导合并的大党派新进党失败后，选择与自民党合作，自民党放弃对创价学会的批判，两党在选举中共同获取创价学会的选票支持。

1989年公明党第27次临时全国党大会确立石田幸四郎委员长和市川雄一书记长的新领导体制，形成与自民党小泽一郎的政治互动。1993年在小泽一郎的设计和多方政治角力之下，细川护熙非自民非共产的八党联合内阁成立，公明党四人入阁的同时，书记长市川雄一在联合执政党的决策机构“联合执政党代表者会议”中掌握主导权。然而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细川护熙和羽田孜内阁相继倒

台，形成社会党、自民党、先驱新党三党联合内阁，公明党下野。1994年公明党以分党方式加入新进党。新进党虽然在1995年参议院选举中重创自民党，但内部矛盾导致其不到三年时间便解体。1998年公明党复党。1998年上台的自民党首相小渊惠三面对桥本龙太郎任内参议院选举的失利，主动拉拢公明党，寻求联合实现对参议院多数席位的掌控，并在缩减众议院比例代表名额问题上做出妥协。1999年，公明党加入自民党主导的“自自公体制”。

这一时期，在公明党与自民党“造反派”小泽一郎合作对抗自民党的过程中，公明党与创价学会的关系成为自民党攻击的主要目标。1993年下野后的自民党展开一系列批判活动。自民党联合其他在野党在1993年秋季临时国会、1994年通常国会、临时国会上围绕政教合一问题对创价学会和公明党展开批判；1994年自民党发起包括神道政治联盟、灵友会、立正佼成会等宗教界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组成“四月会”，口号是“确立信教与精神性尊严与自由”，在日本各地举行活动全面批判创价学会、公明党和新进党。公明党分党之后主要国会议员并入以小泽一郎为党首的多党重组而成的新进党，1995年参议院选举中有创价学会大量选票支持的新进党成功对抗自民党，自民党、社会党、先驱新党三党执政联盟勉强维持住参议院半数席位。因此，攻击创价学会、分裂新进党成为自民党的重要工作。1995年3月20日发生奥姆真理教事件，自民党借机提出《宗教法人法改正案》，改正案要求将跨地域的大型宗教团体的管辖权由地方上交文部省，并要求增大教团资金的透明度。1995年11月，众议院宗教法人特别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改正案，自民党在参议院宗教法人特别委员会主张发起对池田大作进行证人传唤，经过公明党系新进党议员的斗争，最终确定1995年12月4日改为对时任会长秋谷荣之助进行证人传唤。12月8日《宗教法人法改正案》正式通过。1996年自民党干事长加藤纮一在国会提出《政教分离法案》和《宗教基本法案》。

面对自民党的一系列批判，新进党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要维持公明党系议员的联盟关系，利用创价学会的选票；另一方面又不能过度维护创价学会，以免为自民党提供口实。1995年9月新进党党务人事变动，撤换政务会长市川雄一和国会运营

委员长神崎武法两位公明党系议员，公明党系议员与新进党之间产生裂痕。

面对公明党分化与自民党持续批判的局面，创价学会也采取灵活应对策略。一方面指责自民党利用国家权力对宗教团体进行迫害，违反政教分离原则，结合战时受到政府打压的经历，制造舆论攻势，以青年部为中心在日本各地开展抗议集会活动，进一步强化教团和平反战的公众形象。另一方面，在选战投票问题上放弃对固定党派的支持，采取以候选人资质、理念，即“人物本位”为标准的助选战略。创价学会于1994年11月10日第35回总务会上发表了《对今后政治的基本见解》，该声明首先阐明了创价学会对宪法中政教分离原则的理解——“‘政教分离’原则目的在于保障‘信教自由’，因此严格禁止国家权力对宗教的介入与干预。但是并不禁止宗教团体参与政治活动与选举支援。”^[19]在此基础上，明确了政教分离的基本立场——“战争中经历宗教镇压的创价学会最大程度尊重基本人权中具有根本意义的‘信教自由’，遵守‘政教分离’原则。不谋求国家赋予的特权与来自国家权力的保护。坚持不由国家权力支配宗教，宗教不支配国家的方针。”^{[19]71}同时，该声明特别提出根据“五五年体制”终结的政界新形势，改变以往只对公明党一党的竞选支持，改为根据候选人的政治姿态、政策主张、人格品德等判断选择支持候选人的“人物本位”^{[19]71}。在1996年地方议会选举中，也出现支持自民党候选人的情况。

面对创价学会在选举中表现出来的中立态度和与自民党的互动，自民党投桃报李，对创价学会、公明党的政策由打压改为拉拢：放弃继续推动《政教分离法案》和《宗教基本法案》；在1998年4月28日自民党机关报《自由新报》上，以不实报道造成名誉损害为由向创价学会和池田大作公开道歉；自民党议员不再参加“四月会”活动，2001年“四月会”解散。至此，自民党主导的对创价学会的批判结束。

四、政党保守化与教团集权化时期（2000年至今）

这一时期，公明党进入较为稳定的自公联盟时期，为保证自身执政党的地位，政策主张不断向自民党妥协，趋于保守，逐渐背离创价学会最初的和

平理念，引发教团内部信众的不满，形成一种宗教政党对母体教团的反噬效果。随着教团卡里斯马式领袖的年老，教团逐渐成为政党政治斗争的工具，这种反噬效果在2000年之后愈发显著。公明党没有足够的力量对抗实力更强的自民党，只得与其在选举中合作，在政策上屈从妥协，以此确保公明党的议席，从而巩固执政地位。对于创价学会而言，公明党的执政地位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创价学会免受自民党引导的政治权力和社会舆论的攻击，但是公明党的保守化加剧了本就处于世代更替过渡期教团分裂的可能性。创价学会一方面由于支持公明党引发了部分会员的反对，另一方面面临后池田时代如何延续池田大作卡里斯马性维系教团的问题。因此在这一时期创价学会两次修改会则，制定会宪，强化会长职权，加强教团中央集权制，并建立了象征着现代性宗教文化的创价文化中心和代表“日莲世界宗创价学会”总本山的广宣流布大誓堂。

（一）政党保守化

2000年小泽一郎领导的自由党分裂，一部分脱离“自自公体制”。随着首相小渊惠三病故，代表自民党鹰派“清和会”的森喜朗、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相继上台，表面上虽然依然是自公联盟，但在自民党鹰派主导下的日本政坛加速右倾化。森喜朗上台后，在神道政治联盟国会议员恳谈会上发表“日本是神国”等言论，并主张修改《教育基本法》。2001年，小泉纯一郎取代森喜朗出任自民党总裁，在内政方面推行邮政民营化改革，倡导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大力削减公共事业和社会福祉相关的财政预算，在外交方面强化日美同盟，执政五年连续六次参拜靖国神社，造成日本与周边亚洲国家外交关系紧张。2006年第一次安倍晋三内阁极力推进修宪问题的相关法律。2009年自民党因众议院选举失利下野，公明党随之下野，自公联合政府倒台，但自公合作并没有终止，两党合作在2010年的参议院选举中控制了多数议席，给执政的民主党制造了“扭曲国会”的局面，并在2012年众议院选举中夺回执政地位，第二次自公联合执政期自2012年开始至今。

公明党在自公联盟中面对自民党的右倾，一直宣称发挥“刹车作用”，但回顾自公联合执政以来二十年的日本政坛，不得不说是政坛整体保守化的趋势下，公明党对自民党的牵制力是有限的。自民

党不再以政教分离为借口批判创价学会和公明党，而是在历次选举中相互合作，利用创价学会的选票支持，扩大和巩固两党的议席数。2000年以来，自民党主导的自公联盟政府通过了多项涉嫌违反宪法和平主义原则的法案，如：《周边事态法案》（1999）、《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2001）、《伊拉克特别措施法》（2003）、“有事法制相关七法案”（2004）、“解禁集体自卫权”（2014）、“新安保安法案”（2015）、“有组织犯罪处罚法修正案”（2017）。

在修改宪法的问题上，公明党是否放弃了自成立以来“坚持宪法第九条”的一贯方针成为舆论讨论的焦点。在参众两院宪法调查会对现行宪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公明党于2002年11月2日的第四次党大会上，首次提出了“加宪”的修宪方式，并在2004年10月30日的第五次党大会的“活动方针”中指出：“在坚持宪法第九条第一项‘放弃战争’和第二项‘不保持战斗力’规定的基础上，将载明自卫队的存在与对国际社会的贡献方式等内容作为‘加宪’的讨论对象，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14]^[276]。2017年年末，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在记者招待会中表示“关于修宪问题具体项目的讨论尚未开始”^[20]，2018年5月3日第71回宪法纪念日时，公明党明确表示宪法作为法律规范应当适应新时代而改变，主张在维持原宪法的基础上，以添加必要规定的所谓“加宪”的方式修宪^[21]。

（二）教团集权化

1. 由支持公明党引发的教团分裂。2000年以来，公明党和自民党组成长期稳定的合作模式。在选举中两党互相支持，争取最大议席数。在政策方面，公明党不断向自民党妥协。在这一过程中，创价学会逐渐成为服务选战的工具。创价学会拥有号称827万户的信众规模和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尤其是每次选战前会员通过自身的人际关系向周围各种亲朋好友拉选票的“F作战”，能够准确地统计票数，为公明党拉拢大量选票，并节省其选举经费。创价学会之所以能够高效率地组织会员投票，是因为会员投票支持公明党已不单单是政治意见的表达，而是作为与个人解脱相关的信仰活动中的一环。然而，近年来部分会员认为，自公联合政权中公明党的政策已经有悖于创价学会的和平主义理念和日莲法华的正法思想，对教团支持公明党选举的行为提出质疑和批评。2015年，由创价大学和创价女子短期大学的教师及部分会员组织发起了反对

公明党通过“新安保法案”的签名活动^[22]，有国际创价学会（SGI）会员参与其中^[23]。创价学会会员还参加了反对新安保法案的国会游行活动。

1991年脱离日莲正宗后，创价学会便开始努力维系教团团结。面对近年来由于支持公明党引发部分会员反对，而出现的教团分裂的可能性，教团进一步确立信仰正统性，强化中央集权制，对基层有不同政见的会员进行相应处分，甚至开除^[24]。

首先，创价学会于2002年和2014年两次修改会则，并于2017年制定会宪。前者通过对“本门本尊”“本门题目”“本门戒坛”的重新定义与阐释，确立教团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摆脱传统宗教日莲正宗的束缚，维系教团内部团结，为积极进行海外传教、建设世界宗教提供教理支撑；后者通过将三代会长的卡里斯马制度化，强化“师弟不二”信仰的一致性，明确“学会常住御本尊”和“广宣流布大誓堂”是“日莲世界宗创价学会”的信仰根本，规定“日本创价学会会长”同时也是“世界创价学会会长”，将国际创价学会原本松散的组织进行统一化管理，不断加强现实中会长责任制的教团中央集权体制。其次，创价学会于2012年建成创价文化中心，将其作为展现自身现代性宗教文化的中心，并于2013年建成广宣流布大誓堂，将其定义为“宣誓完成日莲大圣人御遗命世界广宣流布的大愿成就信仰的中心道场”，作为国际创价学会的巡礼中心，预示着进一步推广宗教国际化路线。

2. 后池田时代卡里斯马的日常化。宗教团体在发展过程中经常会由于利益纷争出现分裂，日本新宗教中的大本教、天理教、灵友会等都出现过教团分裂。教团分裂成不同教派的具体原因有很多，包括：政府打压、教团内部丑闻、教主去世、继承人分歧、教义理念分歧等等。

教团教主卡里斯马性越强，对教团的影响力越大，越容易成为信众现实中的崇拜与信仰对象，从而在教团中形成卡里斯马统治，便于组织信众，团结教团。然而一旦这种具有较强卡里斯马性的教主衰老死去，教团则面临分裂的风险。对于采用世袭制或前任教主指定的方式确定继任教主的教团，尽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卡里斯马统治的正统性，但随着驱魅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对教主卡里斯马性本身的质疑，以及教团内其他声称具备前任教主同

样卡里斯马性信徒的出现，完全以教主卡里斯马性统合的教团依然无法避免出现分裂。制度化组织建设相对现代化的教团，往往采取使卡里斯马日常化的做法，实现核心权威的去人格化^①。为了实现卡里斯马型权威转化为教团稳定而长久的制度化权威，将卡里斯马性教团领导人封圣，确定其教团内精神领袖的绝对主导地位，将其思想文字化并转化为教理、仪轨、行为规范等形式的宗教传统，使之成为“永恒不变”的教团精神，随后的教团领袖完全继承这种已实现为日常化的卡里斯马性，将高度的个人崇拜转化为制度化的教义规范，将其作为教团前进发展的理据，从而完成教团由发生发展到稳定期的过渡，避免出现因卡里斯马性教主离世而可能导致的分裂局面。

1930年成立的创价学会已经走过近90年历史，首任会长牧口常三郎草创时期的创价教育学会还是一个以教育工作者为主的团体。第二任会长户田城圣在战后将创价学会重建为一个宗教团体，强化了教义解释和教团组织体制，开始大规模传教。1960年池田大作继任第三任会长，领导创价学会积极参与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平反战等诸多领域的社会活动，并大力开展海外传教、国际赈灾救援活动，活跃在国际舞台，真正实现了教团的飞跃式发展。创价学会历任会长不是通过世袭制，而是以“师弟不二”的师徒制完成世代更替。池田大作1979年卸任会长职务，之后长期担任名誉会长和国际创价学会会长。第四任会长北条浩在任两年后病逝，虽然第五任会长秋谷荣之助于1981年至2006年在任长达25年，但池田大作依然在会员心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教团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具有很强的卡里斯马性。时至今日，教团机关报《圣教新闻》几乎每天都会头版刊登与池田大作有关的报道，杂志《大白莲华》还会每个月刊载池田大作署名的卷头语，不时有会员给池田大作写信宣誓、汇报信仰。在创价学会举行的各种活动中，一般都会有学会的高层干部当场宣读池田大作的祝词。2010年5月13日池田大作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参加本部干部会。1928年生人的池田大作至今已有近10年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2003年，日本媒体已开始流传出其病重的消息^[25]。

① 详见星野英纪等编《宗教学事典》中“宗教指导者”词条，丸善株式会社，2010年，第149页。

如何继承池田大作的卡里斯马性，并利用其继续维护教团团结、避免分裂是创价学会2000年以后面临的重要课题，2010年之后的后池田时代更是如此。

结 语

宗教团体组建政党参政，甚至成为执政党，是现代议会制政治体制中政治多元化的体现，也是现代政党政治格局中宗教与政治互动的主要形态之一。在不具有长期政教合一历史和国教背景的现代化民主国家，宗教政党背后的宗教团体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斗争中的被攻击对象，同时由于其拥有大量的信仰票，又会成为被拉拢和利用的对象。在复杂的现实政治运营中，宗教政党执政理念、政策主张的变化会给追求信仰坚定不变的宗教团体带来考验。一方面，宗教团体出于本能支持自己创建的政党；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政党为获取现实政治利益不断妥协，而提出与教团宗教理念相违背的观点主张的现实情况。现代政党政治活动中，政党变换自身理念与主张的自由度远远大于宗教团体。政党往往可以为了政治利益改变初衷，宗教团体则要求信仰坚定不移，甚至强调通过对逆境的隐忍或抗争求真成圣。对于本已处于世代更替期的宗教团体而言，因支持政党而出现理念的转变很可能造成教团分裂。

创价学会与公明党之间的关系从高度一体化演变为彼此独立又相互影响。创价学会在选票上支持公明党的同时，近年来不断在教理阐释和组织机构方面强化教团中央集权制，减少公明党给教团造成的反噬效果。1964年成立的公明党逐渐从一个在野党发展成为能够掌握国会“关键议席”的政党，进而与自民党组成执政联盟长期执政。创价学会对于公明党而言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绝大多数创价学会会员都是公明党党员，创价学会一直是公明党的后援团体，在历次选举中都是公明党最大的票仓；另一方面，公明党与创价学会的关系经常成为政党斗争的攻击目标。“言论出版妨碍事件”之后，公明党逐渐在人事和理念方面与创价学会产生距离，尤其是1999年与自民党组成执政联盟以来，其政策主张已经造成一部分创价学会会员不满，引发了基层分裂。本已处于世代更替时期的创价学会一旦大规模分裂，势必会对公明党选情造成影响，

同时也将影响到自民党选情，给目前的自公执政联盟、日本政坛添加不确定因素。公明党一方面为维持自公联盟中的执政党地位而屈从于自民党鹰派，同时又要避免由此可能引发的创价学会分裂，在寻找动态平衡的过程中，努力打造国民政党形象，跨越信仰的藩篱，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在当前日本政坛整体右倾保守化的背景下，公明党政策走向会对创价学会产生哪些影响，创价学会将如何建立与公明党的互动机制，创价学会如何进一步解决公明党的政治主张与自身宗教理念的分歧以维护教团团结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考察。

[参 考 文 献]

- [1]徐万胜.宗教与战后日本政党政治[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6):68-72.
- [2]申东镇,李阁楠.日本公明党在90年代政治变动中的作用[J].日本学论坛,2001(3):40-45.
- [3]何劲松.创价学会与政治——以池田大作“中道政治”思想为中心[J].世界宗教研究,1996(2):92-100.
- [4]黄大慧.日本公明党与中日邦交正常化[J].东北亚论坛,2007(3):117-122.
- [5]李方琦.公明党在日本政坛地位及其对华政策研究[D].青岛: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09.
- [6]汪鸿祥.公明党及其对华政策的演变[J].日本学刊,2017(2):62-81.
- [7]王新生.创价学会的社会及政治功能——以高速增长时期为中心[J].日本学刊,2005(1):59-73.
- [8]李若愚.“正常国家化”背景下的自公执政联盟走向——以公明党为中心的考察[J].当代世界,2014(9):69-72.
- [9]宫笠刚.“总体保守化”背景下日本“自公合作”体制走向探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3):105-111.
- [10]薬師寺克行.公明党—創価学会と50年の軌跡[M].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6.
- [11]中野潤.創価学会・公明党の研究——自公連立政権の内在論理[M].東京:岩波書店,2016.
- [12]中野毅.戦後日本の宗教と政治[M].東京:大明堂,2003:203-205.
- [13]塚田穂高.宗教と政治の転軸点——保守合同と政教一致の宗教社会学[M].東京:花伝社,2015:110-159.
- [14]公明党史編纂委員会.大衆とともに 公明党50年の歩み[M].東京:精興社,2014.
- [15]藤原弘達.創価学会を斬る[M].東京:日新報道出版社,1969.
- [16]井上順孝.新宗教事典 本文篇 縮刷版[M].東京:弘文堂,1994:566.
- [17]杉森康二.研究・創価学会[M].東京:自由選書,1976:

249—251.

[18] 松本清張. 創価学会日本共産党十年協定の真実[J]. 文藝春秋, 1980(1): 99.

[19] 創価学会広報室. 今後の政治に対する基本的見解[J]. SOKA GAKKA ANNUAL REPORT, 2016.

[20] 小田中大, 高橋恵子. 自民、遅れる改憲議論発議時期見通せず[N]. 毎日新聞, 2017-12-21.

[21] 公明党. 平和主義体現する9条1、2項は今後も堅持 公明党が憲法記念日アピール[N]. 公明新聞, 2018-05-03.

[22] 創価学会. 安全保障関連法に反対する創価大学・創価女子短期大学関係者有志の会[DB/OL]. [2019-03-29]. <http://sokauniv-nowar.strikingly.com>.

[23] 渡邊直樹. 宗教と現代がわかる本 2016[M]. 東京: 平凡社, 2016: 184.

[24] 宮原啓彰, 重石岳史, 松本祐樹. 新宗教の寿命伸びる教団縮む教団[J]. 週刊ダイヤモンド, 2018(10-13): 36-37.

[25] 島田裕巳. 創価学会[M]. 東京: 新潮新書, 2004: 167.

[责任编辑 孙 丽]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Soka Gakkai and Komeito

BAO Feng-ming

(1Postdoctoral Research Station,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Soka Gakkai, one of the new religion groups in Japan, inherited “Rissho Ankoku ron” the idea of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unity from Nichiren Shoshu, and zealously carried out political activities in the relaxed democratic and rule-of-law environment after World War II, establishing Komeito in 196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ka Gakkai and Komeito has experienced four periods: Period of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unity led by the religious group (1964 to 1969), Period of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1970 to the early 1990s), Period of the religious group becoming a tool of the party’s struggle (the 1990s), Period of conservatism of political party and the centralization of religious group (2000-present). From the 1970s, the policy of Komeito gradually deviated from the religious ideology of Soka Gakkai. The chang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ka Gakkai and Komeito shows that from post-war democratization to politics and religious pluralism, religious forces still have profound influence on Japanese politics. At the same time,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political parties determine that religious parties must take the political power as the highest goal. In the complex political struggle, the political opinions of religious parties often conflict with religious ideas and form the reaction force to their maternal group.

Key words: Japan; new religion; Soka Gakkai; Komeito; Charisma